



主持人孙华：近几年，优化营商环境的惠企利民的创新举措不断推出，营商环境得到大幅提高。今日本报围绕营商环境提高后，企业和资本市场的变化以及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等，采访专家学者给予解读。

资本市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投融资活跃度提升

■本报记者 吴晓璇

近年来，资本市场持续推动“放管服”改革。市场人士认为，随着本轮“深改”推进，资本市场营商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投融资活跃度提升。注册制从科创板推进至创业板，提升了资本市场市场化水平，A股上市公司数量增多，退市制度改革加速淘汰“壳公司”，优胜劣汰市场环境逐步形成。另外，随着投资者保护力度不断加强，以及违法行为得到快速有力打击，投资者信心增强，A股投资者数量显著提升。对外开放亦取得成效，外资稳步入市。

注册制改革 带来三大变化

注册制改革带动了资本市场发行承销、信息披露、交易、退市等一系列制度的改革。

“注册制改革给资本市场带来了三大变化。”博时基金首席宏观策略分析师魏凤春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是真正诠释了市场化，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将上市公司真正交给投资者选择；二是增加市场活跃度，市场交投活跃；三是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退出渠道进一步畅通，上市公司有进有出，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逐步形成。

中山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湛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注册制改革在科创板和创业板成功实施，为A股带来的变化主要包括三方面：首先是上市公司企业数量和融资规模显著增加，为A股带来增量资金；第二，注册制改革使得资本市场为实体经济融资提供便利，同时助力我国经济转型的效果显著；第三，注册制改革是系统性的市场化改革，带动我

国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完善。

“注册制改革有效推动了我国资本市场市场化、法治化的进程，市场活跃度得以提升，融资能力不断增强，价值投资理念和优化资源配置功能逐步彰显。”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投资者保护力度加强 “零容忍”监管促市场风清气正

近年来，监管层一方面持续引导上市公司通过分红回报投资者；另一方面推动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及其落地实施，其中，首例特别代表人诉讼的落地，成为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据证监会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累计已有5万多名投资者通过纠纷多元化解、支持诉讼、先行赔付、示范判决等各类维权机制挽回损失。

李湛表示，近年来，监管部门推动代表人诉讼制度落地生效，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等，切实保护了投资者合法权益。

“零容忍”是近年来监管层对资本市场违法行为的一贯态度。田利辉认为，只有严厉打击违法行为，才能更好地促进资本市场形成不敢违、不能违和不想违的良好市场环境，实现风清气正。

《证券日报》记者据证监会网站不完全统计，截至5月26日，今年以来，证监会和地方证监局已经开出81张行政处罚决定书，合计罚没金额超过14亿元。

李湛表示，新证券法实施以来，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成本显著提升。随着行政执法、民事追偿和刑事惩戒的立体化追责体系不断完善，为资本市场深改提供了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魏凤春表示，监管层持续表态“零容



忍”，对违法违规行为严厉打击，维护资本市场“三公”原则，对违法违规行为产生了强大的威慑力。“作为机构投资者，我们也可以更好地为投资者创造普惠价值。”

高水平对外开放 提升对外资吸引力

“在2019年陆家嘴论坛上，我们宣布了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9条措施。从落地情况看，政策是到位的，效果是好的。无论是市场、产品的互联互通，全面放开行业机构股比和业务范围，还是便利跨境投融资的制度安排，全面落实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要求。”今年3月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圆桌会上表示，截至2020年底，外资持续3年保持净流入，境外投资者持有A股资产突破3万亿元。

“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已形成了以QFII/RQFII、银行间债券市场直接投资(CIBM)、沪(深)港通、债券通、特定品种期货等多渠道开放的的基本格局，为今后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有序进行与健康平稳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李湛表示。

“随着全球经济的恢复，金融市场也逐步修复，基于经济的优先恢复和稳健发展，中国对于外资有很强的吸引力。”魏凤春表示，资本市场要继续坚定对外开放，引导境外长期资金进入高端制造、环保、医疗等行业，助力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魏凤春认为，资本市场市场化改革和基础制度的夯实，是吸引外资的一个重要基础。对于资本市场违法违规行为为的严厉打击，提升了标的投资价值，也是吸引外资的一个重要前提。进一步完善制度，提升外资投资A股的便利度，实现资金自由流动，是资本市场持续吸引外资的重要保障。

另外，随着券商、期货、公募基金的外资持股比例放开，外资金融机构也纷纷加速布局中国。据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我国外资控股的券商已达8家，外资全资控股期货公司和外资全资控股公募基金各有1家。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步伐有序推进，沪港通、深港通等机制迄今运行良好。外资不断涌入中国，有望迎来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在华开展业务。”田利辉表示。

企业对营商环境满意度整体较高 多家公司“点赞”改革成效

■本报记者 杜雨萌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不仅是地区经济软实力和综合竞争力的集中体现，更事关市场主体活力与竞争力的提高。

中国财政学会绩效管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张依群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营商环境改善，尤其是中央以“放管服”改革为重点，相继出台吸引投资、促进消费、改善小微企业发展等诸多政策措施，地方政府也采取“只跑一次”或“一次都不跑”等措施。从效果上看，各地在用地、环保、营业执照、税务登记申报等一系列涉及企业落地的审批手续以及居民生活服务方面，均有非常明显的改善。

营商环境正在加速优化 专项改革效果显著

“营商环境本身就是生产力，优化营商环境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市场主体企业的最切实感受。”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合作研究部主任刘英对《证券日报》记者称，从近年来我国企业开办数量逆势增长，疫情期间中国经济实现难得的稳增长等都能看出，我国出台的优化营商环境等政策及措施，可以说取得了实质性成果。

2019年10月份，国务院正式对外公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下称《条例》)，并明确自2020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在今年1月份举行的国务院政策

例行吹风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表示，《条例》贯彻实施开局良好，取得明显成效，我国营商环境正在加速优化。

为促进《条例》更好落地见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条例》实施一年来的情况开展了第三方评估。张军扩称，评估发现，企业满意度整体较高。调查问卷列出的21个《条例》条目中，有20个条目的平均得分在4分以上(满分5分)。与此同时，去年前三季度新设企业近590万户，同比增长7.7%，表明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起到了很大作用。

以四川省大竹县税务局为例，自去年疫情发生以来，大竹县税务局按照“非必要、不窗口”原则，大力推行“非接触式”办税服务，在大厅窗口兜底“现场办”的基础上，打通了电子税务局支撑“网上办”，“自助办税厅”实时“自主办”多渠道办税渠道，极大地提高了纳税人的办税体验。目前，“非接触式”办税已经成为大竹县办税的新常态，绝大多数涉税业务都能实现智能化办税。

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大竹县主要涉税事项网上办理30000余件，线下服务厅一般业务平均办理时长只需3分钟，等候时长5分钟，基本上实现了随到随办、即办即走。

“水”好才能养好“鱼” 上市公司为改革点赞

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

量，上市公司不仅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力军，更可以说是中国企业的优秀代表。在张依群看来，上市公司的数量多少、发展的质量好坏，是一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实力的体现，更是营商环境的一个重要缩影。

同花顺iFinD统计显示，截至5月26日收盘，A股共4319家上市公司，从其所属的地区看，北京市391家、浙江省550家、江苏省511家、上海市353家、广东省713家、重庆市57家、四川省142家。也就是，仅上述7个省份的上市公司数量就高达2717家，占全部A股比重的62.9%。

“从数据上看，我国上市公司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和成渝等重点经济区域，这些区域的经济增长速度、质量明显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同时，其营商环境排名也处在全国前列。”张依群认为，当地政府给予企业的，已不仅仅是简单的优惠条件，而是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好的预期，帮助企业未来发展运行上简化不必要的繁杂环节，让企业能够更加安心落户、谋划长远的未来。

以A股上市公司——四川川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川环科技”)为例，川环科技办税人员张耀告诉《证券日报》记者：“以前基本上两三天就要跑一趟办税大厅，而且许多事项必须要到前台才能办理，去了之后还要拿号、排队，办完所有事情差不多要半天时间。现在发票都在网上申领，再给我们直接邮寄。另外，一般事项也可以直接在电子税务局办理，不需要再到大厅前台，节约了许多时间。”

这些都是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实实在在的举措，让投资者有更强的参与感，增强投资者的信心。

推进公司治理，亦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体现。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已经形成了较为全面的公司治理制度体系。这些制度设计，为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基础，是保证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

值得关注的是，证监会副主席阎庆民日前透露，证监会正有序推进开展上市公司治理专项行动，力争通过两年左右时间使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得到明显

提高，进一步健全权责法定、权责透明、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运作、有效制衡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

可以预期的是，通过专项治理行动，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将会得到进一步提高。这对保护市场参与各方的利益，提高上市公司竞争力，培育并增强市场信心，吸引更多的投资者，也是大有裨益的。

优化营商环境，资本市场能做的远不止这些。但万变不离其宗，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让市场更有吸引力，同时，也让市场各方更有获得感。

用张耀的话说，对于营商环境改善最为明显的感受就是：办税时间越来越短、流程越来越简单、方式越来越便捷。无独有偶，作为我国高端无线通信测试仪器行业的代表性企业，于2015年在新三板挂牌的上海创远仪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创远仪器”)，对此有同样的感受。

创远仪器创始人兼董事长冯跃军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近年来，长三角税收营商环境不断向好，开通了长三角电子税务局，出台了“最多跑一次”“长三角区域通办”等清单，一条高速公路“网路”的建成，让企业办税成本更轻、目标更明、信心更足了。

“上市公司的质量和数量一定会受营商环境的影响，并且可以将其简单类比为‘鱼和水’的关系。”在刘英看来，上市公司的数量除了与当地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密切相关外，良好的营商环境亦能够催生出更多优质的上市公司。

中国企业联合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高蕊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从理论上讲，上市企业的数量、质量与营商环境之间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而营商环境不仅起到辅助作用，应该说是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营商环境反映的是一个地域的综合实力。反过来，上市公司的发展也有助于营商环境的改善。即这不仅仅会对一个地域的产业基础形成强有力地支撑，同时也有助于人才引进、技术进步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投资。因此，营商环境的改善和企业发展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

“人民币升值是内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内因是主要的，中国经济基本面恢复向好态势，特别是外贸形势持续向好，贸易盈余保持较高水平，再加上资本持续流入，有力地支撑了人民币升值。外因方面，美国大规模释放流动性，美元走向疲软，不仅造成美元计价的商品价格上涨，也促使其他经济体货币被动升值。”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对《证券日报》记者说。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迎来了一波上涨行情，有效应对输入性通胀成为相关部门工作之一。近日，央行上海总部调查研究部主任吕进中撰文表示，我国作为全球重要的大宗商品消费国，国际市场价格输入性影响不可避免。建议坚持稳健货币政策，注重

聚焦汇率

提价、锁汇、海外建厂 应对人民币升值外贸企业有招

■本报记者 刘琪
见习记者 杨浩

近期，人民币汇率走出一波升值行情。5月26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涨势还在继续。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数据显示，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上调184个基点，报6.4099。

对于人民币升值，外贸企业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一般而言，人民币升值有利于进口，会降低进口企业的采购成本，增加盈利，但对出口企业则会造成不小的压力和挑战。外贸企业是如何应对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影响呢？5月26日，《证券日报》记者采访了多家有代表性的企业。

“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对公司的影响不小。”在浙江宁波一家以文具出口为主营业务的小型外贸公司工作的朱女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公司的客户主要来自美国、英国等国家，其中很多客户是去年下的订单。去年因受疫情影响，集装箱出去之后无法返回，因此客户订的货品就发不出去。而货品的价格都是之前下单时敲定的，货款要等客户收货之后才能支付。现在人民币升值，这无形之中就造成了亏损。

“面对这种情况，公司也没办法，亏了也就亏了。如果之后客户再下订单的话，可能就能稍微提高点价格，比如提几分钱，一般老客户都能理解和接受。”朱女士说。

湖北荆门市的钟祥兴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食用菌及农副产品种植与加工。该公司的干香菇年销量约5000吨，以出口为主，销往欧美、东南亚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司董事长程世伦告诉《证券日报》记者，今年受海外疫情还在持续的影响，海运“一柜难求”，对公司的出口业务已经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而近期人民币汇率的持续上升令程世伦更觉苦涩，但是他依然积极去面对。“最近我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跟客户沟通重新定价；二是跟银行沟通锁定

汇率。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锁汇避险”是很多以出口为主的外贸企业当下的选择。浙江省一家从事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的公司，近几年来外销业务占比逐年增高，2020年出口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达到60%。该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证券日报》记者：“由于公司进出口货物主要结算货币为美元，汇率波动肯定会对公司经营带来影响，近期我们也在密切关注中。”

当问及目前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风险时，该人员称，“公司采取了远期锁汇业务来对冲汇率损失，例如2020年公司实现锁汇收益约300万元。此外，公司还与具有相关业务经营资质的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了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以此来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的影响。”

不过，也有外贸企业面对人民币升值表现得较为“淡定”。广东省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华南地区最早开展纺织品和国际贸易业务的国有企业，出口业务占公司贸易总额的73%。该公司总经理杨全兴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也注意到了4月份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幅走高，其实我们公司一直都在持续关注汇率变化，采取相应的措施积极应对，因此对公司的影响较小。”据他介绍，目前公司主要通过远期外汇交易来降低汇率波动风险。此外，公司还在国外有多个自建工厂，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汇率波动对生产成本带来的影响。

从受访的企业来看，普遍都能理性看待汇率波动，面对汇率波动也都采取了合理的避险措施。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在最近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企业应该立足主业，理性面对汇率涨跌，审慎安排资产和负债的货币结构；合理管理汇率风险，以保持财务稳健和可持续为导向，而不应该以套保的盈亏论英雄。

专家：人民币升值一定程度上 可抵消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压力

■本报记者 包兴安

来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5月26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4099，较前一交易日上调184个基点。近期人民币升值走出一波升值行情，尤其是进入4月份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路上涨。

粤开证券研究院负责人康崇利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今年4月份以来，人民币汇率重回走强态势，由多方面因素所致。首先，4月份美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下行，美国实际利率下行，经济复苏动能放缓。5月份以来，美国就业疲弱、通胀飙升引发美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波动。其次，中国对外贸易的高景气度、经济修复和自身综合实力提升，使得国内资产吸引力提升，提高人民币需求，从而推动人民币升值提升。第三，中国产能继续恢复，今年对美出口有望继续保持高景气，贸易顺差为人民币升值提供助力。

“人民币升值是内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内因是主要的，中国经济基本面恢复向好态势，特别是外贸形势持续向好，贸易盈余保持较高水平，再加上资本持续流入，有力地支撑了人民币升值。外因方面，美国大规模释放流动性，美元走向疲软，不仅造成美元计价的商品价格上涨，也促使其他经济体货币被动升值。”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对《证券日报》记者说。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迎来了一波上涨行情，有效应对输入性通胀成为相关部门工作之一。近日，央行上海总部调查研究部主任吕进中撰文表示，我国作为全球重要的大宗商品消费国，国际市场价格输入性影响不可避免。建议坚持稳健货币政策，注重

进出口平衡，增强汇率弹性，人民币适当升值，抵御输入性效应。

“市场存在通过人民币升值控制输入性通胀的政策预期。”康崇利认为，目前，我国进口金额的增长主要来自海外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后续若人民币继续升值，预计大宗商品的单价涨势会减缓，甚至出现下降，进而减弱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导致的输入性通胀以及我国进口企业面临的成本压力。

刘向东表示，人民币升值反映了当前经济发展的基本面，但对于大型开放经济体来说，人民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抵消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压力，但同时对外贸出口形成压力，而且单边的人民币升值还会带来更多的投机行为和资产价格泡沫，进而引发风险。因此，引导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和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能形成稳定的市场预期，给内外企业提供稳定的内外环境，降低汇率波动风险对利润的侵蚀。

5月2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会议时强调，进一步推动汇率市场化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康崇利表示，未来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将继续取决于市场供求和国际金融市场变化，双向波动成为常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要继续发挥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的决定性作用，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加强宏观审慎管理，稳定市场预期，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坚持“风险中性”理念，夯实人民币的国际信用基础。

刘向东认为，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应进一步推动汇率市场化改革，使其有管理的浮动，并根据经济形势发展情况促使汇率由市场供求决定，反映国际金融市场变化情况。

良好的营商环境会给资本市场“增粉”

■择远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促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提高市场吸引力的重要举措。

这些年来，监管部门在这方面推出的一系列举措可圈可点。其中，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是提升营商环境的关键指标。

面对超过1.8亿的A股中小投资者，监管层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要保护好投资者合法权益，营造投资者愿意来、留得住的市场环境。并且，也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比如，对违法违规行

为，证监会始终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予以严厉打击。同时，深化与其他部门的执法协作，持续塑造市场良好生态，让投资者公平地参与资本市场投资。

据证监会数据显示，2020年全年，证监会作出处罚决定349项，罚没款金额53.11亿元，市场禁入100人次。同时，依法从规范市场主体运作，2020年全年对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分别采取行政监管措施612家次、159次；对证券基金经营机构采取行政监管措施267家次，对责任人员采取行政监管措施282人次，对私募机构采取行政监管措施144家次。